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促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史守林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列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提出“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的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锚定文化建设目标任务不放松,努力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文化条件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充分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要有物质生活的富足,更要有精神生活的富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充分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努力提高创造精神财富的能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然也是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文化来源于人,也服务于人。习近平同志曾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充实和提升,能够为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奠定坚实基础。为此,应切实保障文化权益的普惠性。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使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前提下,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造搭建平台、创造条件,让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这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在要求,也是释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根本之道。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破解制约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不断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应坚持把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努力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迈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延伸文化产业链,大力发展文化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新应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变革、扩大发展空间。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文化市场体系,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积极培育新型文化经营主体,优化文化产业资源配置,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加强文化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提升文化市场服务质量,增强文化市场活力。加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建设,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序发展文化产权、版权、人才等要素市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创新生产经营机制,更好释放文化产业潜能。

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文化原创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有助于创造出全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并激发人们的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新征程上提升文化原创能力,就要把握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紧跟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以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创造出更多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成果。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守正创新,既尊重传统又勇于突破,既不失文化根脉又与时俱进。同时,提升文艺创作生产整体效能,为文艺工作者创造更加优质的环境和条件,激发其创作热情与灵感,从而推动更多兼具艺术价值与社会影响力的原创精品问世。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是补齐文化发展短板的重要途径。《建议》提出:“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这一要求为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近些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实现“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大幅提升,较好满足了广大城乡群众的文化需求。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城乡、区域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不均衡性、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差距依然存在。为此,应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给,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促进城乡公共文化协调发展。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加大对脱贫地区文化建设投入力度,不断提高脱贫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引导优质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向特殊群体倾斜。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向改革要效益,着力解决制约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公共文化设施运营和产品服务供给,提供多样化文化产品和服务。打破信息壁垒,建立资源共享机制,探索用“文化+”的方式盘活各种公共服务资源。构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机制,努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群众满意度。优化基层数字文化服务网络,扩大优质公共文化产品的覆盖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实效性,构建开放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

优化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当前,人民群众更加注重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要求公共文化服务能够提供更多特色化个性化多样化的优质产品。为此,应完善创作引导激励机制,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推出更多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精品力作,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建立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对接机制,建立更多公众沟通渠道,让人民群众更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决策。提供反映中华优秀传统价值理念、符合时代审美和引起审美共鸣的文化产品,提供传递积极向上思想力量、引导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培养健康生活情趣的文化产品,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文化产业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繁荣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样化、高品位文化需求,推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牢牢把握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一方面,身处数智时代,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加快赋能,广泛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开辟文化产业新赛道,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具有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特点,是典型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体现出创新性强、融合性强、可塑性强的优势,契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我们应抓住机遇,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发展壮大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努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以科技和文化融合推动文化传播方式深刻变革。科技能够促进文化形成新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产业形态。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十五五”时期是建设文化强国、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的关键时期,推动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让科技为文化赋能、文化为科技铸魂。数字技术的深度运用,能够把传统文化内容转化成数字形式的文化产品,人们可以沉浸式观赏历史场景、艺术作品、文化遗产,文化体验的交互性和自主性都获得极大提升;能够极大创新文化产品服务介质与形态,数字影像、数字娱乐、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数字藏品、数字文创等新型文化产品层出不穷,互动短视频、互动小说等深受欢迎。为此,应做好“人工智能+文化产业”的大文章,深入开展文化产业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开发。促进戏曲演艺、工艺美术、会展等传统文化行业数智化转型创新,鼓励采用人机协同、虚实交互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增强文化产品表现力、传播力和感染力。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从资源要素、产品设计、生产创新、市场消费、传播推广等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寻找融合点,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和项目。把文旅融合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统一起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和传统村落整体保护、活态传承,推动文体旅、文商旅、农文旅等融合发展,培育研学旅游、工业旅游、体育旅游、冰雪旅游、生态旅游、康养旅游等业态融合发展。

作者:史守林,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据《光明日报》)

新时代形塑新文风

□尹韵公

文风深嵌于时代的肌理之中,这个特征在文学史上已经得到足够证明。曹丕有言:“文以气为主。”这里的气,乃指时代气息。而白居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更是深刻洞察了时代与文风之间的密切关联。

当下,移动传媒、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迅猛发展的新技术新业态新变化,已经和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时代风貌相应地形塑着新话语和新文风。新文风形塑的最鲜明特征,是涌现了批量式的新词新语。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伴随着每一次重大信息传输技术的颠覆性革命,人类的辞典总会增加一大批新词新语,以求响应时代的新反映。比如,目下经常使用的“信息茧房”“降维打击”“人设崩塌”“打卡胜地”“达人”“丝滑”“赋能”等新话语展示的新表达,闪亮出新文风的应用场景,也弥补了旧叙事话语的不足和欠缺。新词、新语、新表达给文风形塑注入了新鲜元素和灵动活力,但也给文风建设带来了一些可能的伤害。故此,新文风必须大力倡导和强调积极的正能量氛围。

古人曾经看重文风的“正声”,即将社会主流价值观贯穿于文风,曰:“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先哲甚至把文风建设当作治国理政的抓手,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壮哉斯言,我们难道不应该有超越古人的智慧、气派和能力吗?

作者:尹韵公,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据《光明日报》)

“不进则退,慢进亦退”

□石浩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机遇总垂青奋进者。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明“不进则退”的道理,强调“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很快,不进则退,慢进亦退”“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不进则退,慢进亦退”,既体现对前路绝非坦途的科学研判,也包含对发展进程中逆水行舟客观规律的深刻揭示。

奋斗关乎发展存续,担当决定发展位势。无论是在个体实现生命价值的成长之路上,还是在一个国家实现富强的漫漫征途上,“不进则退,慢进亦退”都激励着每一位奋进者校准坐标、勇毅前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中的这句话,将天地运行不止的自然规律与君子修身立业的价值追求相贯通,揭示出“进”是事物存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邓析子》中言明“不进则退,不喜则忧,不得则亡,此世人之常”,宋代《朱子语类》中说“凡人不进则退也”。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在人类文明长河中赓续5000多年而绵延不绝,密码正在于中华民族对“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的深刻认知,以及融入血脉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大战略投入,意图抢占科技制高点,对技术、人才、标准和规则的竞争空前激烈。在这场全球竞争与时代大考中,唯有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科技突破以赋能产业升级,深化改革开放以激活发展动力,才能把握发展先机、赢得竞争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再到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拓展发展新空间新机遇……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战略的落地,正是我们以“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紧迫感、使命感、行动力破局制胜的生动体现。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离不开每一名党员干部以“进”的姿态主动担当。“不进则退,慢进亦退”,不仅仅是个人的成长命题,更是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为国家发展担当尽责的必然要求。数智时代,知识迭代周期不断缩短,若固守既有能力体系,不愿学习新技能、接纳新思维,就会在竞争中落后。只有跟上时代发展节奏,才能在各自领域创造价值,既为自身发展筑牢根基,也为国家发展积蓄力量。若在工作中满足于完成任务而非追求卓越,在责任面前选择“躺平”、推卸而非主动担当,看似个人的“小懈怠”,最终会演变成影响国家发展的“大阻力”。身处变革时代,面对复杂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要以本领恐慌的紧迫感、危机感倒逼自己提升能力,结合工作需要,做到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面对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主动拥抱时代变化,在了解和熟悉新技术过程中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契机、找到破解改革发展难题的新办法。

“不进则退,慢进亦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取精神的深刻诠释,是在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上被无数实践印证的客观规律,更体现我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葆有的昂扬精神。我们的建设发展没有“中场休息”,更容不得踟蹰不前或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唯有时刻以争先者的姿态击水中流,以担当者的自觉拼搏进取,方能推动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在时代舞台上创造新的发展奇迹。

(据《人民日报》)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要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就必须制定一种能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快速促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积累的时间战略。这种时间战略必须既能够确保我们“赶上时代”“与时代同行”“引领时代”,又能够让我们在“压缩现代性”的加速过程中保持新的平衡。全球著名投资家瑞·达利欧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提到,中国决策者具备哲学意识,善于从更大、更渐进的视角,为未来而未雨绸缪。的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重视并强化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准确认识世界发展大势,将对时间的认知融入一套阶梯式递进、不断完善的发展规划体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展现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和治理智慧。

读懂中国共产党发展规划的时间逻辑

□曹东勃 王艺腾

[时间哲学的深刻变革]

“要抓住这个时间窗口”“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的宣示重若千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间哲学的深刻理解。

人类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时间观,一种是前现代社会循环往复、厚古薄今的周期性时间观,它将社会理想秩序寄托于往昔或先贤。其与农耕时代人们的劳作方式有着密切关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生活是从容闲适的、有韵律节奏的,当然也不免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另一种是在现代化展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简单线性、无限进步的时间观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形成的深刻动因,植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及生活步调加速。在竞争逻辑推动下,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剩余产品持续增长。人类被裹挟进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社会亦进入到一个“强制进步”的全新节奏,当然也不免在时间的“加速”中本末倒置、“见物不见人”。自此,人类的时间体验也被资本与技术全面重塑。

马克思有言:“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马克思主张将时间作为人拓展自身、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这对中国共产党人启发甚深。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百余年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主动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来定义时间,并实践着“将时间转化为人的发展空间”的理念;同时,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最终将时间具象化于一整套兼顾长远与当下的战略规划体系。这种对时间的独到领会,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继承,实际上还源于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深切的忧患意识与艰辛的救亡实践,源于对现代化这一历史使命的自觉承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近代以后,中华民族被各种内忧外患耽误的时间太久了,因此中国人民始终有着超乎寻常的紧迫感、时代感。为了实现民族复兴,“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

由此,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时间的流逝,而是将自身看作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在尊重历史规律之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将时间看作可以通过主动塑造、科学规划的历史过程,既着眼当下又立足长远。这种新型时间哲学承继了中华文化“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的时间观,克服了西方线性进步观的局限。人的主体性、国家发展的可能性、社会治理的能动性被“时间规划”和“规划时间”激活,呈现出生动活泼、昂扬向上的发展状态。

[时间治理的实践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他也曾对时任意大利总理孔特这样阐述——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这向西方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思考问题并不受一时的政治周期或经济波动影响,而志在实现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和人类社会的大同团结。无独有偶,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接见外国政党代表团时也曾提出: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此语也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耐心与战略定力。

耐心与定力唯有付诸实践,方能激发出推动社会变革的磅礴伟力。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将长远与当下统一的智慧,具象化为一套多层次的规划体系,确保其时间智慧能转化为实践效能。

首先,最顶层的是战略指引层,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持续上百年的判断,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长期谋划,以及“分步走”的战略蓝图。这就要求准确判断内外部形势,确定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解决国家发展大方向的问题。它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保持历史耐心的总基调,也是所有规划的总依据。由此,我们主张“一张蓝图绘到底”,倡导“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甘于投身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业。

其次,发挥衔接作用的是发展规划层,即把上述“分步走”的步骤以五年为间隔来制定五年规划,后者也成为治国理政框架中打通远景目标与年度任务的重要枢纽。这一枢纽与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党代会,一同形成政治定向与政策执行有序协同的一体化设计。这种设计本身也从制度安排上决定了“一茬接着一茬干”,并能够根据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灵活调整重点工作任务。此外,中央和地方层面还构建覆盖多个领域的规划体系,比如《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等,形成共促改革攻坚的强大合力。

最后,是抓落实的执行操作层,这主要是通过每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确定政策基调,并通过来年的两会,依托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过去一年工作成就和不足的基础上,部署当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及工作任务。由此,社会发展蓝图被分解为具体的年度工作任务,确保狠抓落实、久久为功。

上述三层规划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以细节决定成败的韧性和耐性勾勒出逼近圆满的宏伟蓝图的时间治理实践。它既兼顾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辅之以机动调整政策方针的战略灵活性,构成了稳定而高效的实践框架。

[时间智慧的当代价值]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规划中展现的时间智慧,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更显可贵,也为思考大变局下国家发展和全球治理问题提供启示。

一方面,这种智慧体现了长期主义的发展原则,是对现代社会发展弊病的有力回应。受工具理性和市场思维的影响,现代社会存在突出的“即时满足”或“短期偏好”现象,个人、企业甚至政府在功绩或效益的驱动下,会不同程度地过于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这种现象在数字化生存下更是被技术逻辑空前地放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通过制度化的长远谋划,确保国家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沿着既定目标勇毅前行,防止出现方向性、颠覆性错误。从摆脱贫困到全面小康,再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都体现了这种远见。

另一方面,这种实践智慧为世界提供了应对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中国将现代化这个宏大工程不断从宏观到微观进行细化、精准化的、具体而微的目标任务分解,实际上也呼应了马克思所指出的,“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中国在发展规划推动下,使既定目标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逐步收敛为零。社会不断进行量的积累、实现质的跃升,整个现代化进程展现出阶梯式递进、波浪式前行的图景。即便针对国际问题,中国致力于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与长期繁荣进步,也贯穿立足长远、持之以恒的战略思路。这种兼顾长远与当下、理想与现实的中道智慧,为世界各国思考如何驾驭改革发展问题,以及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了可行方案。

作者:曹东勃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王艺腾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据《中国青年报》)

地址:阿勒泰市红墩路296号 编辑部:0906-2315197 邮编:836500 广告经营许可证:10011-03 广告发行部:0906-2315709 印刷:阿勒泰地区泰昇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厂址:阿勒泰市解放路七区59-1号 全年定价:228元 零售价:1元